

论托尔斯泰小说《卢塞恩》的人性限度

王 静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卢塞恩》是一篇可以反映托尔斯泰早年思想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一个流浪歌手被文明人所拒并加以嘲弄的事件,藉此谴责文明社会的虚伪和冷漠,并进而否定文明社会的进步意义。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和调和人间矛盾,作者从抽象的“永恒道德”观念出发,相信有一种“世界精神”可以使人们相互亲近;托尔斯泰主义已初见端倪。分析托尔斯泰主义在自我道德完善方面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反思托尔斯泰主义在人性理解方面的局限。

关键词:《卢塞恩》;托尔斯泰主义;道德完善;人性;社会平等;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3-0069-04

《卢塞恩》(旧译《琉森》,创作于1857年)是托尔斯泰早年创作的一部说教意味颇强的自叙性作品,这是根据他旅行欧洲期间亲历的一次见闻写成:“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那家头等阔佬下榻的瑞士旅馆门前,一个流浪的讨乞歌手唱歌弹琴达半小时之久。百来个人听他演唱。歌手三次要求施舍。没有一人给他任何东西,有许多人还嘲笑他”^{[1]23};托尔斯泰认为这是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比报章史册所记载的那些事重大得多,严酷得多,具有更深刻的意义”^{[1]24},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高度文明、自由、平等的国度,发生在最文明国家的最文明旅游者集中的地方,因而更加触目惊心、也更加无法使人忍受;这是文明社会罪恶的表现。然而,面对这样的罪恶,作为见证的个人能有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如何实现,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何才能为全体人类共享?托尔斯泰在苦苦思索这些问题后不得不从宗教教义中寻求答案,并认可上帝的意旨中也包括“恶”的存在,所以人们只有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托尔斯泰日后的许多主张,例如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博爱等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在这篇小说中已初见端倪。

一、对社会道德的反思

小说中的聂赫留朵夫是一位青年贵族,与居住在瑞士旅馆里的英国绅士太太属同一阶层。但他反感于他们在社交场所造作的虚礼伪善、道貌岸然,更愤怒于他们在听完歌手的演唱之后所表现的矜持、冷漠、吝啬和残忍;为补偿自己为同一阶层的人所感到的愧疚,也为了表达对歌手的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这一朴素的愿望,他主动邀请歌手与他去瑞士旅馆共进晚餐,但这一不合适的善意使他在餐厅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以及侍者对于歌手肆无忌惮的轻慢举动,于是他与侍者大起冲突,最后以他斗争的胜利而告终。在此短兵相接的过程中,社会各等级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法律制度自身的冷酷与不公正暴露得尤为明显——“在这个社会里,侍者穿得比歌手漂亮,他就可以侮辱歌手而不受惩罚。我穿得比侍者体面,就可以侮辱侍者而不受惩罚”^{[1]25}——身处上位的聂赫留朵夫由此开始思考人类的善恶问题: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为了分清善恶,不断地拼搏和劳动。世纪不断过去,凡是讲公道的人,你不论在哪儿把他放到善恶的天平上,天平决不会摇摆:一边有多少善,另一边就有多少恶。一个人要是能学

收稿日期:2013-02-22

作者简介:王 静(1974-),女,江苏南京人,讲师,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会不判断,不苦苦思索,不回答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那就好了!他要是能懂得一切思想都是真真假假的,那就好了!它之所以假,是因为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它之所以真,是因为人有追求真理的一面。人们总是在这永远运动着的善恶混杂的无边海洋里进行分类,在想象中划分这海洋的界线,并指望海洋真的会一分为二,仿佛不可能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面做出其他无数种分法似的。……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役是恶。正是这种虚假的知识扑灭了人性中最本能最幸福的对善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只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指导,那就是毫无例外地渗透在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中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促使我们每一个人追求应该追求的东西;这种精神促使树木向着太阳生长,促使花卉在秋天撒下种子,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相亲相爱。^{[1]26-27}

托尔斯泰刚完成小说初稿时非常激动,当即写信给瓦·彼·鲍特金(1857年7月9日),信中说:“在琉森,有一件事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我感到有必要把它在纸上表达出来;……我写完了,基本上满意,并很想读给您听听……”^{[2]203}但鲍特金的反应却很冷淡,他认为:“这部作品从各方面看都不仅是幼稚的,而且还是令人讨厌的……而其中最不招人喜欢的就是作者本人。”^{[2]204}不仅仅是鲍特金,而几乎是托尔斯泰同时代与之通信的友人都对这部作品的观点持反对态度,例如:屠格涅夫曾经坦言:“我不喜欢,因为它是卢梭、萨克雷及东正教简明教义问答的大杂烩。”^{[2]204}巴纳耶夫同样认为:“他的短篇小说《琉森》对读者的影响不好……显然,这是一位高尚、有才能、然而却是稚嫩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竟会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实而引出了天知道是什么的结论,且还对人类世代代用血汗创作出来的一切成果都给予无情的抨击。”^{[2]205}显然,大家并不十分理解托尔斯泰对于文明社会的这种卢梭式的批判激情,也不认同他对于“深入我们内心的世界精神”的这种宣教方式。

如果说友人们的意见是从艺术角度对作品所表露的批判性与说教性给予了全面否定,那么托尔斯泰本人则是对作品中的所流露的情感倾向和道德价值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的自我否定:1857年10月11日,在写给尼·阿·涅克拉索夫的信中,托尔斯泰说:“我的文稿发表了,重读一遍时,却发现写得何等卑污啊,平淡无奇的卑污。我以这篇东西完全欺骗了自己,似乎也欺骗了您。”^{[2]55}

托尔斯泰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他发现,善的愿望在恶的环境中无法发挥其正直的作用,所以他渴望在内心深处接受一种或许自己也并不完全相信的说教^{[3]151}。

二、爱的疑难

我们无法怀疑托尔斯泰的思考是否诚实,他为流浪歌手在世上最文明的地方遭遇到最文明的人对他的人格践踏所感到的震怒也是真实的——这一点不难从他的笔记和与友人的通信中看出,但是,他为什么又会感到自己行文言语之间存在着“卑污”与“欺骗”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小说中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内心深处不经意的剖析和表白,则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观察别人首先要学会观察自己,了解别人首先必须了解自己,人性的深度制约着我们对“人”理解的限度。那么,聂赫留朵夫具备这种观察“人”和了解“人”的能力吗?也就是说,他具备理解歌手——这个“人”的能力吗?他对于歌手的关爱和尊重是为歌手还是为自己?他的“爱”是襟胸坦荡和公正无私的吗?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对我们的问题作出了负面的回应。

例一:聂赫留朵夫有感于流浪歌手的动人歌声和无人给予布施的尴尬处境以及黯然离去的神伤背影,他提议跟歌手到什么地方喝一杯。歌手的回答是:

“好吧,既然您一番好意,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这儿有家小咖啡馆,可以去坐坐,是个普普通通的地方,”他补充说,指指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店。

他说“普普通通的”这个词,不由得使我想到了不该到那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去,而应该上那家有人听过他歌唱的瑞士旅馆。尽管他胆怯而兴奋地说瑞士旅馆太奢侈,谢绝到那儿去,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1]12}

聂赫留朵夫此处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一个为生计而歌唱、此时已疲惫不堪、最需要一杯酒来解渴的人来说,普普通通的咖啡馆与豪华奢侈的瑞士旅馆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聂赫留朵夫想的却是如何示威——向那些聆听过歌手的歌唱却不给予他任何布施的冷漠的文明人示威,而并没有想到一个豪华奢侈的旅

馆是否会令一个“外表邋遢、衣衫褴褛”、口袋里只有一个半法郎而夜无归处的流浪者局促不安。

例二：席间，流浪歌手对聂赫留朵夫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的被迫卖唱的生涯，也谈到这一天没有得到布施的感受，他认为自己的才气不足，嗓音嘶哑，不能够打动别人所致，但聂赫留朵夫却认为这里住的都是阔佬，他们应该为他的歌唱付给他报酬，但歌手却为他们辩解：“这儿主要是警察局限制太严，问题就在这儿。根据这儿的共和国法律，他们不让你唱，……”^[16]歌手认为，他的卖唱行为是违法在先，所以，那些听众不给予他报酬无可厚非，但聂赫留朵夫却认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虚伪和贪婪所致，“人人都喜爱诗歌，找寻它，追求它，可是谁也不承认它的力量，谁也不珍惜这世上最大的幸福，谁也不看重和感激把这种幸福献给人类的人”^[17-22]，世上的人大多认为幸福就是金钱，所以他们能够肃静地倾听矮小乞丐的歌唱，却不愿意施舍一个生丁，这就是他们的贪婪。面对同一处境，遭遇不幸的歌手从自身寻找问题的症结，而出身优越的聂赫留朵夫却总是想着别人对自己的亏欠和世界的不公，相形之下，歌手的灵魂愈显高尚博大，但聂赫留朵夫却显然对这种灵魂的力量感到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他对歌手的了解微乎其微。

例三：聂赫留朵夫与侍者起冲突之后，希望更滋事端，他遭到英国游客的投诉，但旅馆方并没有采取行动，“侍者把头探进门来瞧。我欣然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怒气往他们身上倾泻，但总算他们走运，没有来干涉我们。这使我有失望”^[21]。“失望”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但也由此暴露了自己真实的心态。综观小说全部情节，聂赫留朵夫对于歌手的所有善举，无一不是针对自己内心对于上层社会的一种愤怒，而丝毫没有顾及到被施予者的内心生活和艰难处境，甚至极端到欲将他作为自己向周围一切人发泄愤怒的工具。如果“博爱”是建立在一种私欲的基础上，漠视他人人格的独立，那么，这种“爱”至少不是一种坦率的、真诚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人性盲点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人性的限度

托尔斯泰认为他的这篇小说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读者。“欺骗”，是托尔斯泰在自我省察时常常挥之不去的一种恐惧和自虐心态；所以，一味强调托尔斯泰“爱”的虚假，这对于托尔斯泰个人来说并不公平。托尔斯泰总想怀着一种真诚的态度去实践感动于自己刹那间的那一个真实的想法或愿望，然而由于过分关注自己，他即刻开始怀疑自我情感的真实性，践行“爱”的理想动机，以及施“爱”过程中暗藏着的对人对己的欺骗，这个内心深处隐秘的声音常常使他的探索裹足不前，因此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无法抵达未来；“欺骗”于是成为他的一种有效的自我逃避的托词。他在“欺骗”的罟网中挣扎，不止一次地坦露自己灵魂所施展的“欺骗”；有一则关于托尔斯泰的事例与小说中聂赫留朵夫的“爱”的善举的心灵轨迹颇为相似。

19世纪60年代，托尔斯泰曾在自己的庄园兴办小学——教育培养农民的孩子，以弥合教育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农民与贵族之间的社会不平等，并发行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但他渐渐地对学校感到失望，正如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对百姓行善的尝试中感到失望一样，他说他在自己对儿童的态度中看到了某种“罪恶”。从他当时的学校日记中，我们读到他对儿童的关怀远不如对自己的关怀。比如，他让孩子们写作文，然后再自办的教育刊物上宣称这些作文比托尔斯泰、普希金、歌德的作品还要完美——然而这显然是一种“欺骗”，欺骗自己也欺骗这些学生，但他却这样说并这样做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分析道：“也许他是在自己的心灵，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做着对自己来说十分重大，但对孩子们却并不安全的实验。他，像长生的纳尔西斯一样，欣赏自己在儿童心灵中的影像，有如在深邃而纯净之泉水中影像。……他是凭藉孩子们来爱自己，并且只爱自己。”^{[4]25-26}

同样地，聂赫留朵夫对于歌手施行的也是这样一种“爱”，他原本希望自己能够真心尊重歌手，关怀他的生活，然而这种“爱”在刚刚萌发的瞬间即刻变成了“欺骗”；于是歌手成为聂赫留朵夫“爱”与泄愤的道具。托尔斯泰在回首这一幕时看清了这一点，他渴望自己绝对的真诚，但同时又发觉自己处处充满谎言，于是他向友人揭发自己的“卑污”和“欺骗”。

在小说的末尾，托尔斯泰将各种思考归结为上帝的理性法则，他认为个人的力量渺小，不足以理解上帝的仁慈和睿智；他想像着此时的歌手正坐在月光溶溶的天空底下，在花香扑鼻的静夜里快乐地歌唱，内心没有责备、没有埋怨、也没有悔恨，而那些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们无法享有这种无忧无虑的生之欢乐以及与世无争的满足感，所以上帝是公平的，他规定了矛盾的存在。如果自己妄想探索上帝的意旨，同情歌手或责备上层社会

或对侍者表示卑微的愤慨,则是对这“永恒的无限和谐”的冒犯^{[1]27-28};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尽力完善自我道德,如同歌手;而对于世间的一切事件,则应该完全保持沉默。

托尔斯泰对于道德完善、人间友爱、上帝法则的精神探索持续了整整一生,但由于人性的限度——爱的能力的匮乏——使他的这种探索始终是一场悲剧性的体验,他无法做到诚与真的绝对统一。深深扎根于俄罗斯民族的忏悔意识、对于“罪恶”的痛苦意识以及对于生活意义的强烈探求,使托尔斯泰陷入道德迷惘和信仰焦虑。小说《卢塞恩》作为一篇宣扬以“世界精神”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说教式作品,既显示出托尔斯泰主义的特色——以上帝理性法则来消弥个人道德困惑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暴露了作者对于人性的理解限度,使得慰安成为一种“欺骗”。

参考文献:

- [1]列夫·托尔斯泰. 卢塞恩[M]//托尔斯泰小说系列·哥萨克. 草 婴,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 [2]苏·阿·罗扎诺娃. 思想通信——列·尼·托尔斯泰与俄罗斯作家:上[M]. 马肇元,冯明霞,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 [3]尼·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M]. 雷永生,邱守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4]梅列日科夫斯基.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M]. 杨德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On the Limits of Humanity in Tolstoy's *Lucerne*

Wang 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Lucern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reflecting Tolstoy's early thought. Through the event of a street singer being refused and mocked by the civilized people, Tolstoy condemned the hypocritical and indifference of the civilized society, and entirely deni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social problem and reconcile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Tolstoy believed that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Eternal Moral and the Spirits of One World could make people close each other. Tolstoyism was emerging from the novel. The main idea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that Tolstoyism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erfection of personal morality, as well as point out its limits in the understanding the humanity.

Key words: *Lucerne*; Tolstoyism; morality perfect; humanity; social equality; soci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 陈 静)